

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

斯当达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

斯当达精选集

罗新璋 编选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3.75印张 6插页 548千字

1997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0001—15000

ISBN7—5329—1381—3

I·1216 定价 29.70元

出版说明

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，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。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。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、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，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，本社隆重推出“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”。

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，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，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。

书系以“名家、名著、名译、名编选”为目标，分批出版。

对译者、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，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2005/6

编选者序

斯当达作品述略

罗新璋

瓦莱利指出：“斯当达喜欢的题旨是：拿破仑，爱情，魄力，幸福，从而演绎出浩繁的卷帙。”^① 通常的印象里，巴尔扎克名篇就数不过来，称得上卷帙浩繁，殊不知斯当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，亨利·马蒂诺编的《斯当达全集》（1927—1937）就达七十九卷之多。文学史家朗松评衡道，“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，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隐私，《红与黑》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，不下于整部《人间喜剧》四十巨帙。”也有论者认为，《红与黑》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。推崇《红》书的人，不乏溢美之辞。就读者面而言，斯当达不及巴尔扎克广，但同跻身于十九世纪大作家之列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巴尔扎克熟读拿破仑著作，早年编过一本《拿破仑文选》；相传写《人间喜剧》时，书桌上置一尊拿破仑塑像，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：“彼以剑创其业，吾以笔竟其功”！在拿破仑崇拜方面，斯当达也绝不让于巴尔扎克。还在小学生时期，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，不禁惊喜雀跃。斯当达景仰波拿巴将军，而贬抑拿破仑皇帝，尽管风云变幻，他把自己心目中的

^① 《瓦莱利作品集》第一卷第五五六页，七星丛书版。

英雄始终奉为“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”，并庆幸自己能步伟人之后尘，进入米兰、柏林、维也纳，直到莫斯科，亲身践履“拿破仑诗史”！滑铁卢一败，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，斯当达于一八一七年底振笔疾书，几个月写了一本《拿破仑传稿》；时隔二十年，又写下他的《忆拿破仑》。一八三七年，斯当达已过知天命之年，自撰《亨利·贝尔传略》（斯当达为笔名，亨利·贝尔乃本名），写到最后一句，言尽于此：“生平只敬仰一人：拿破仑。”^① 他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，充沛的精力，敢冒风险，雄才大略。拿破仑是斯当达全部著作关注的一个中心，无论小说、游记、文论、史书，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。

从著述来看，斯当达小说家的才能，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。他成就最大的，是小说；小说中最成功的，是《红与黑》。书中的主人公于连，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磕出来的人物。斯当达把于连写成“内地青年，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”。跟拿破仑^② 一样，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。为迎合时势，他《圣经》能倒背如流，但最喜欢的书，“作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，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”，是《圣赫勒拿岛回忆录》。有空一回到房里，最痛快的事，就是“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”。与市长较量占上风之后，觉得“应当乘胜追击。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，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，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。”

同样一种英雄性格，由于所处时代不同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。于连神往于拿破仑，但已非生于“功名只向马上取”的拿

① 《斯当达自述作品集》第二卷第九八〇页，七星丛书版。

② 相传一七八八年，拿破仑一次在奥松驻地关禁闭，随手捡到一本查士丁尼法律汇编，闲来无事，逐字逐句看了下去。事隔十五年，制定拿破仑法典时，他随口引证罗马法典，令在场法学大家相顾失色。

破仑时代。只引得他一声浩叹：“噢，拿破仑！你那时代，靠打仗出生入死，以博取荣华富贵，那多痛快！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，岂不卑鄙！”是的，到了一八三〇年，“军人没有出路，教士不是出路”^①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壮士有不得出之悲。故《红与黑》这部小说，实际是写一失败，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。

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荡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，那么，于连则是“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”^②。他生就火热的性格，充满着进取精神，向往于英雄行为，但在一个复辟倒退的社会，便成了一个拒斥现存秩序，颠覆神圣事物的叛逆分子。于连“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”，如他自己所说，“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。”在自己家，和粗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去；进入社会，在市长家、修道院、侯爵府，看到庸俗、虚伪、委琐，觉得格格不入；而那时代，已不是“面对强敌，凭我漂亮的行动，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”。家庭，社会，时代，三不合宜，就苦了他。他年轻有为，也曾想干一番事业：“比如说我吧，竭智尽忠，为人正派，至少不让于瑞那先生，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？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，以及他们所有的鬼蜮伎俩！公理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！”但他既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去征服世界，名扬天下；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，去惩恶除腐，伸张正义。他只能面对“残酷的现实，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，再以虚伪的言行，行其欺诈的勾当”。他倾向雅各宾主义，却参加保皇党密谋；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，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。他“为自己位卑命艰而敢于抗争”，在敌对

① 李健吾《意大利遗事》“引言”第八页，上海译文一九八二年版。

② 斯当达语。见《斯当达小说集》第一卷第二〇二页，七星丛书版。

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。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，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，他不惜功亏一篑，也要泄愤报复，慨然走上断头台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求上诉，不乞一命，固不失为好汉，但终究是一个悲剧。这个悲剧，是于连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。

《红与黑》的副标题，为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。斯当达后来说，这部小说是根据“一个现成故事”敷衍而成的。所谓“现成故事”，当指发生在布朗格的一桩情杀案：安多华·贝尔德系马掌匠之子，家境清寒，但自幼聪明，靠本堂神父进了修道院，因体弱不耐苦修，初进米舒先生家当家庭教师，不久因与主妇有染而见逐，复回修道院，再进郭尔冬先生家任教，这次因钟情千金小姐而遭辞退。在走投无路之际，以为是昔日情妇从中作梗，便于一八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礼拜天弥撒祭时行刺米舒夫人，旋判死刑，于翌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断头台，年仅二十五。这桩案子为斯当达提供了小说情节。如把安多华、米舒、郭尔冬易为于连、瑞那、拉穆尔，则俨然是《红与黑》本事，道地的“现成故事”的“纪事”。斯当达自称并未杜撰什么^①。虽然故事情节方面没杜撰什么，但他把自己的阅历，对社会的观察，于心理的卓识，融进了作品。随着于连人生的历程，小说从市长家到修道院，从小城到省会，从内地到巴黎，从底层直到上流社会，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场景，揭示出深刻的社会内容。

斯当达说，《红与黑》意在描写一八三〇年的法国^②。作品不仅在总体上，全景式展示复辟王朝时期，尤其是查理十世

① 斯当达用 D. Gruffot Papera 化名写的文章里称：“M. de Stendhal n'a rien inventé.”

② 见斯当达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致出版家函。

(1824—1830) 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，而且在细节上，如书中提到的《奥利伯爵》(罗西尼歌剧，春季复演)、《艾那尼》(雨果浪漫派名剧，二月二十五日首次上演)、《曼侬·列斯戈》(芭蕾舞剧，五月三日首演)、“英国新王登基”(乔治四世于六月二十六日去世，新王威廉四世随即登基)等事都发生在一八三〇年，点出特定的年份。所以，斯当达这部主要写于一八三〇年上半年的小说，提到许多发生于一八三〇年的真事，确乎称得上是“一八三〇年”的纪事。

“小说好比一面镜子，鉴以照之，沿着大路，迤逦行去。”这是斯当达在书中提出“小说一镜子”论的由来。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，于是我们在斯当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，圣公会的肆虐，贵族社会的奢糜与保皇势力的猖獗。镜子“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，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”，这能责怪镜子吗？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，就不能不涉及时政。而一八三〇年，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，七月革命的爆发，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·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。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，就意味着是本有很强政治性的小说。斯当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：“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，就不成其为了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。你这本书，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，成其为一面镜子。”斯当达深知，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，会把文学拖下水的。“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象，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。”

作为小说家，斯当达的高明之处，在于《红与黑》中固然有“枪响”，但更充满了“妙趣无穷的想象”。六年后斯当达重读旧作，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：“只有在小说里才能臻于真实。”

《红与黑》如斯当达标榜的是部“纪事”作品，但并不妨碍象征的运用。小说开初就叫《于连》，到上部写毕，才定名为

《红与黑》。以两种色彩词作书名，当有寓意存焉。历来书评家绞尽脑汁，颇多发明，认为“红”与“黑”，喻军装与道袍，剑与十字架，热血与孝服，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，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，英勇时世与复辟年代，等等，甚至比附于赌盘上的红黑两色，喻人的命运变幻莫测。真可谓挖空心思。相对而言，斯当达本人的说法倒较平实。他死后，其友人福尔格在悼念文章里谈到，照斯当达意思，“‘红’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出世得早，会去当兵，但他生活的年代，只得披上‘黑’道袍了。”书名如此，书中其他象征，如山洞这意象，也一再出现。维璃叶后山腹壁有个小洞，于连觉得“于我特别亲切”，他开始人生征途之前，乐于厕身其间，即使死后也愿安息那里。此处山洞，疑为温暖、安宁、母性洞穴之隐喻。又，论者还注意到，于连每当有大动作，前去征服女子，必先竖起梯子云云。

从“纪事”角度讲，《红与黑》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；但从所占篇幅，从艺术成就而论，实为爱情小说无疑。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情爱，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，深刻细致，不愧大家手笔。时当十九世纪前半叶，刻划恋爱心理方面，斯当达还有开创之功，对后世，对国外，都有久远的影响。因《红与黑》的出版，一八三〇年成为法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。但一般人或许不知道，斯当达成为写爱情的高手之前，已是论爱情的能人：《红与黑》成书前八年，先有《论爱情》（1822）一书问世。直到晚年，斯当达都认定此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。他在自传性作品《亨利·勃吕拉的一生》中说：“我早年饱尝爱情之苦”，所以感受必多，思索必深。尤其写《论爱情》时，正溺于对高傲的梅娣儿特（Métilde Dembowski）无望的爱恋中，借强烈的相思，做成一份隐秘的告白，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激情的一本论著。书中提到，“第一次握到所爱女子的手，乃爱情所能

予人的最大幸福。”宜乎《红与黑》里写于连晚上在花园乘凉去握瑞那夫人的手，成为小说著名片段之一。书中有专门章节讨论各国不同的爱情生活，说出一句警句：“法国人爱虚荣，意大利人多热情。”法兰西与意大利，在斯当达是两个相对的概念；巴黎式的爱情与意大利的爱情自是不同，如玛娣儿特与法尼娜·法尼尼^①，前者虚荣而浪漫，后者狂热而不顾一切。

前面说到，在斯当达各著作中，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。就说《拉辛与莎士比亚》（1823）吧，这是一本文艺辩论集。拉辛喻指拘守三一律的古典主义戏剧，莎士比亚标志不受程式束缚的浪漫主义文学。斯当达认为，文艺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应与时俱进，他张扬浪漫主义新思潮，向古典主义旧形式发难。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是：“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”，应表现他们时代的事，感动他们时代的人；而一切浪漫主义又都会变成古典，正如古典主义曾是当时的浪漫主义一样。从论旨可看出，此处浪漫主义，宜解读为现实主义，盖现实主义一词当时未之有也，直要过三十年才作为贬义词初露头角。斯当达所鼓吹的浪漫主义，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本人的文学创作。当然，反对拉辛的古典主义，并不意味着反对悲剧。悲剧是永远需要的，但不要恪守三一律、通篇用格律诗写出的悲剧，而应为同时代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悲剧，一种质朴自然、用散文写的悲剧。悲剧是永远需要的，因为在斯当达生活的年代，就发生了近代史上最大的拿破仑悲剧。谈拉辛，也不忘拿破仑，斯当达就在该论集最后一节，拟了以失败的英雄拿破仑为主人公

^① 斯当达十岁时就显出热烈的禀性，特别倾心于意大利人的热情与血性，一生三分之一时间住在意大利，把米兰视为第二故乡。本集从其《意大利遗事》选取《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》和《法尼娜·法尼尼》两篇。

的《厄尔巴岛归来》——一部“五幕散文体悲剧”的提纲。

《拿破仑传稿》，名副其实，以拿破仑为传主，是斯当达对拿破仑军事才干的一次礼赞，对人类伟大灵魂的一曲颂歌。斯当达以史学家的严谨，引用大量已刊材料，重现拿破仑早年打过的仗。此书计划庞大，实际只写了个开头。要了解拿破仑战役，最权威的还是看《圣赫勒拿岛回忆录》。斯当达的好友梅里美曾表白：“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”；准此，特译出《传稿》的序言和一二掌故。瓦莱利谈到斯当达，说了句俏皮话：“这作家，会做戏。”（Il y a beaucoup de l'acteur dans cet auteur.）斯当达姑勿论，且看他的小说笔法。拿破仑二十七岁出任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，一些老将觉得听命于年轻的长官简直是一种侮辱，但拿破仑身份一变，那姿态，那目光，那声腔，自能拒人于千里之外！于连在角色变换方面的表现也不俗。穿短打的小工刚换上家庭教师的黑礼服，他略一自我调整，再出场时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，“说他稳重，还不够；应该说，他就是稳重的化身。——介绍给孩子之后，他开始讲话，那神气连瑞那先生看了都吃惊。”

本集选斯当达小说与论集各三部。小说方面，这位作家最好的长篇、最好的中篇、最好的短篇，自信俱已选出。一般读者与外国文学爱好者，涉猎斯当达，三篇一翻可窥一斑。斯当达其他论著，包括游记、回忆录、日记、书信、遗嘱（不下二十份）等等，总数远远超过小说作品的量，而且大多尚未翻译过来，似较难选，这里只选有助阐发《红与黑》的三种。不当之处，有望读者与识者赐教。

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

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

编委会

主 编 柳鸣九
副主编 钱海骅 张立升 国祯明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王守仁 吕同六 朱 虹 沈石岩
张 黎 张立升 国祯明 罗新璋
金志平 柳鸣九 钱海骅 高 莽
高中甫 高慧勤 陶 洁
主编助理 张晓强

编选者简介

罗新璋，原籍浙江上虞，生于上海。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。曾在外文局长期从事中译法翻译工作，任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法文组组长、编委会委员。一九八〇年，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，职称译审。

译作有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(1991,人文版)，《列那狐的故事》(1988,人文版)，《红与黑》(1994,浙江文艺版)，《栗树下的晚餐》(1986,漓江版)等。编译有《巴黎公社公告集》(1978,上海人民版)。校读《傅雷译文集》全十五卷(1981,安徽版)。为商务印书馆编《翻译论集》(1984)。撰有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》、《傅译罗曼罗兰之我见》、《钱钟书的译艺谈》、《中外翻译观之“似”与“等”》及《释“译作”》等文章。

责任编辑：张海珊
装帧设计：韩济平
版式设计：刘小军
黄晓春

目 录

编选者序 斯当达作品述略	罗新璋 (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长 篇 小 说

红与黑	罗新璋译 (3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中短篇小说

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	李健吾译 (567)
法尼娜·法尼尼	李健吾译 (667)

文论·散文

论爱情 (片断)	刘 阳译 (697)
拉辛与莎士比亚 (片断)	王道乾译 (714)
《拿破仑传稿》序	罗新璋译 (726)
附录 斯当达生平及创作年表	易非易编 (737)

长篇小说

